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BRONZES
UNEARTHED IN CHINA

3

| 山西 上 |
| SHANXI I |



科学出版社



龍門書局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李伯谦 主 编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科学出版社



龍門書局

北 京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 山西 上 |
| SHANXI I |

主 编 马 昇 谢尧亭
副主编 武俊华 韩炳华 张慧国

 科学出版社  龍 門 書 局
北 京

版 权 声 明

本书所有内容,包括文字内容、图片内容、版面设计、内容分类以及其他任何本书信息,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为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未经本书相关权利人特别授权,任何人不得转载、复制、重制、改动或利用本书内容,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 李伯谦主编. — 北京: 龙门书局, 2018.12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ISBN 978-7-5088-5522-6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青铜器(考古) — 出土文物 — 介绍 — 中国
IV. ①K87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8999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雷 英 樊 鑫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装帧设计: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 学 出 版 社 龙 门 书 局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 × 1194 1/16

201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20

字数: 3 072 000

定价: 7600.00元(共二十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编委会

总策划 林 鹏

执行策划 李 锋 闫向东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昇	王 辉	王凤竹	王晓毅	方 勤	田 凯	史家珍	白 岩	白九江
刘 宁	刘 旭	刘 斌	刘延常	刘海旺	安文荣	孙英民	孙周勇	李文瑛
邹后曦	张元成	张文瑞	张昌平	陈永志	陈星灿	林留根	罗 丰	周必素
郑同修	赵永军	哈比布	宫希成	贾连敏	顾万发	徐长青	高大伦	郭伟民
唐 飞	梅鹏云	曹 劲	曹 玮	曹建恩	盛建武	韩立森	程武彦	谢日万
熊建华								

主 编 李伯谦

副主编 刘 绪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秋伟	于崇远	万 娇	万全文	马 昇	马 强	马萧林	王 玥	王 剑
王 莹	王立华	王志刚	王金平	王京燕	王振芬	王晓毅	王爱国	王效军
王智远	毛保中	方 刚	方 辉	方向明	尹秀娇	卢 涛	叶 蓉	田正标
田名利	田建文	冉宏林	冯 好	邢 毅	吉琨璋	吕 静	朱存石	乔 虹
任相宏	刘 伟	刘 凯	刘 彦	刘 焰	刘 新	刘亚彬	刘延常	刘庆平
刘红军	刘志勇	刘春喜	刘振陆	刘晓东	刘海旺	刘雅婷	刘德银	齐 新
闫 勇	闫光星	许 超	孙建军	杜博瑞	李 飞	(贵州省博物馆)		
李 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李 刚	李 倩	李 铭	李 晶	李 媛
李文瑛	李龙彬	李民昌	李国华	李国学	李宝垒	李荣华	李慧竹	杨 帆
杨 军	杨 波	杨月光	杨正宏	肖承云	吴 辉	吴志跃	邱玉胜	邱新宇
何海蓉	闵 锐	宋长城	张 伟	张 惠	张云涛	张文惠	张立明	张合荣
张红星	张君弘	张雪菲	张崇宁	张强禄	张新宁	张翠敏	张慧国	陈 亮
陈 慧	陈卫东	陈以琴	陈永耘	陈志学	陈丽新	陈顺祥	武俊华	林 强
林留根	罗 丰	罗 霞	罗向军	季宏伟	周必素	周学良	周科华	郑同修
郑志宏	孟华平	胡 勤	胡春佰	侯红伟	宫衍军	姚 练	秦树胜	夏伙根
夏连保	原 丰	徐文英	徐倩倩	高成林	郭 明	郭 物	郭军涛	郭晓东
唐 飞	唐 音	黄 峰	黄凤春	黄昊德	黄建勋	曹 劲	曹志君	龚 良
龚张念	崔大庸	梁中合	梁玉根	梁志龙	葛 洪	董 峰	蒋廷瑜	蒋志龙
蒋俊春	韩炳华	程 卫	傅吉峰	傅聚良	谢 焱	谢尧亭	谢虎军	靳 军
蓝日勇	楼建龙	赖祖龙	雷 雨	虞海燕	赫玉建	蔡路武	谭 勇	熊贤礼
魏 国								

编辑组	闫向东	孙 莉	张亚娜	王光明	李 茜	雷 英	樊 鑫	吴书雷	郝莎莎
	赵 越	柴丽丽	王琳玮	王 钰	董 苗	郑佐一	王 蕾	闫广宇	蔡鸿博
	周 颀	张睿洋							

凡 例

1.《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为“中国出土文物大系”之组成部分。

2. 全书共20册。出土青铜器资料丰富的省区单独成册,或为上、下册,或为上、中、下册;其余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地域相近或所收数量多寡,合并成册。

3. 本书所选资料,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博、考古机构提供。选入的资料兼顾了青铜器所属时代、特色,注重突出标准器和艺术品。所收资料截至2018年。

4. 全书设前言,每册有概述。

5. 关于器物的编辑排序、定名、时代、尺寸、文字说明:

编辑排序:首先,各卷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按时代先后排序。其次,在按时代排序的基础上,按器类排序: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度量衡及其他等。其中鼎按先圆鼎、后方鼎排序。

定名:不加形状、纹饰、铭文、用途、性质等(鼎除外,鼎分圆鼎、方鼎)。

时代:夏代、商代前期(以武丁为界)、商代后期、西周、春秋、战国、秦代、西汉、东汉。

尺寸:单位为厘米。

文字说明:图片上能够看到的内容尽量不赘述,客观描述为主,少主观性发挥。

山西卷编委会

编 委 马 昇 谢尧亭 韩炳华 张慧国 王爱国 王金平 王晓毅 田建文 吉琨璋
 张崇宁 王京燕 武俊华

参编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昇 王 瑞 王金平 王金梅 王京燕 王晓毅 王爱国 田建文 白曙璋
 吉琨璋 杨林中 杨勇伟 何晓燕 张崇宁 张慧国 武俊华 韩炳华 谢尧亭

参编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博物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

山西省出土青铜器概述

马 昇 武俊华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东岸、太行山以西,独特的区位优势孕育了璀璨的古代文明,也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文物遗存。夏商周时期的山西,是连接中原与北方之纽带,在中国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山西青铜器的发现渊源已久,汉、唐时就已散见于文献记载。入宋以后,始有图铭流传,如著名的晋姜鼎即收录于北宋吕大临《考古图》,清光绪《山西通志》则记载了几批出土铜器。实际上,自晚清以来,出土地点明确而至今仍存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且大都流散海内外,落入世界各地的公私藏家手中。1949年以后,文物考古工作步入新的阶段,大量科学发掘出土的青铜器面世。山西地区这些精美丰富的青铜器积累,无疑为中国历史和古代文明研究增添了重要的实物支撑。

1. 虞夏

山西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铜器制品,主要出自龙山时代的襄汾陶寺遗址。这里迄今出土了5件铜器:铜环和出土于宫殿区的铜器口沿残片属陶寺中期,铜铃和铜齿轮形器出自陶寺晚期小墓中,还有1件铜蛙未发表。其中铜铃放在M3296墓主人腰侧,顶上无纽,铃内无舌,铃腔窄小,运用复合范技术铸造;铜齿轮形器出土时与玉璧叠粘套在M11墓主人手臂上,铸造而成。铜铃和铜环都是红铜,而铜齿轮形器与铜残片则是砷铜,尽管并非青铜制品,但范铸技术的运用,特别是陶寺铜铃的出土,表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末叶已掌握了较为高级的复合范铸造工艺,这些铜制品成为研究青铜铸造工艺的最早样品。绛县周家庄遗址是运城盆地东部的大型陶寺文化聚落遗址,调查发现1件陶寺早中期的铜片,为镍黄铜制品,冶炼方法原始。此外,在山西曲沃东白冢遗址发现了这一时期铸造所用的坩埚片等冶炼遗物。这些发现,充分反映了铜器制作漫长的技术探索过程。

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各地发现的铜器种类和数量均有显著增加。二里头文化铜器普遍采用先进的范铸技术铸造铜容器,且赋予其礼制的内涵,而与周边区域明显区别。这一时期的山西铜器,也主要见于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典型遗址中,如夏县东下冯遗址、轅村遗址,垣曲

县古城南关遗址,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等。东下冯遗址铜制品始见于遗址第三期,主要是工具和武器,计有铜镞、铜凿、铜刀等10余件,以镞为主,其中第四期出土了1件可能是铜爵流部的残片。这些铜制品多仿造石器而来,除了第三期的1件铜凿为红铜外,其余均为青铜制品。另外,在第三、四期遗存中还出有少量斧、凿的石范残块(未见铜斧实物),铜炼渣30余块。夏县轅村遗址早年采集了1件二里头时期铜爵,流口残,短尾、束腰、平底,三锥足,器壁轻薄,口沿加厚,环形耳上下各有两处长方形镂孔,整器素面无纹饰,铸造粗糙,形体拙稚。这是目前山西发现的年代最早、最完整的青铜容器。垣曲南关遗址铜制品只有1件二里头晚期的铜镞,所出的铜镞石范为晋南豫西地区所仅见。苇沟-北寿城遗址二里头时期灰坑中出土青铜刀1件,曲背凸刃,尖部微上翘,背部有一道凸棱,形制与二里头所出基本相同。

二里头时期铜器在山西仍属零星发现,质地以青铜为主,多为消耗性的工具和武器,器类有镞、刀、凿,以及制作镞、刀、凿、斧、镞的石范。从陶寺文化的红铜、黄铜、砷铜制品到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为主,对不同铜制品性能和合金技术的认识显然有了巨大的进步。相比工具和兵器,轅村和东下冯出土的铜爵铸造工艺更为复杂,无疑实现了铸造技术的一大跨越。铜炼渣和各类石范块的出土,也暗示着当时的晋南地区存在青铜冶铸技术和范铸工艺。青铜时代已然来临。

2. 商代

商代早期,山西大部分地区仍很少有青铜器发现,唯独在商人直接控制的晋南地区夏县东下冯、东阴,垣曲南关商城,平陆前庄等地点有集中出土。东下冯遗址第五、六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冈时期,铜器仍以工具和武器为主,计有铜刀、铜镞、小铜刀等10余件,同时在二里冈上层铜器墓M4中出土了1件随葬的铜容器爵。古城南关出土二里冈时期铜容器、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近20件,其中铜容器占了相当比例:二里冈下层M16出罍、爵各1件;二里冈上层M1出鼎、罍、爵各1件。平陆前庄祭祀遗址二里冈上层

铜器群则是这一时期山西铜器最重要的发现,共出土鼎、鬲、爵、斧等铜器7件,特别是1件方鼎和2件圆鼎,体形硕大,颇具王者之气。这批铜容器在种类、形制、纹饰、组合、工艺上都呈现出全新内容,制作较为精致,器表装饰丰富,组合运用带状的兽面纹、成排的乳钉纹、弦纹等,器壁较薄,除方鼎用分铸法外,其余都采用浑铸法一次浇铸而成,极大丰富了山西商代早期青铜器的文化内涵。与二里头时期相比,青铜器数量稳步增加,特别是薄胎容器增多,制作工艺已较为发达。二里冈下层阶段,仍以铜镞、刀、凿等武器、工具及其石范为主。容器除爵之外,又新出现了罍,制作粗糙,装饰也很简单。到二里冈上层时,铜容器开始在不同地点多次出现,主要器类有大方鼎、大圆鼎、鼎、罍、鬲、爵、匕等容器,刀、凿、斤、针等工具,镞、鏃等武器。这种变化,正是铜器制作能力和铸造工艺不断提高的反映。从浇铸痕迹观察,分范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兽面纹、乳钉纹等装饰。从随葬青铜容器的情况看,青铜礼器作用已经初步显现。

商代中期,山西青铜器数量继续增多,出土地点也开始扩散。在商文化分布地区,以长子北高庙商墓为代表,出土鼎、鬲、甗、爵、觚、罍、戈、镞等铜器19件,与殷墟同类器一致。在商文化的外围地区,也有零星的发现,如黄河东岸吕梁山区南段的隰县庞村、永和榆林、大宁太德、洪洞上村,北段的忻州连寺沟等,这些地点出土铜礼器与商文化同类器区别不大,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互动交流的结果。此时,铜器种类更加丰富,以容器为大宗,有炊食器鼎、鬲、甗、簋,酒器爵、觚、罍、罍,水器盂,兵器戈、镞,工具斧等。从形态特征上看,铜器以三足容器为主,鼎多深腹,圜底,锥足中空,一耳对应一足与两耳置三足间的情况同时存在;爵平底略凸向卵底发展;器体粗矮的铜觚出现;流行束腰平底式罍。器表的花纹装饰逐渐繁复,流行无地纹的单层兽面纹,画面立体感增强。长子北高庙铜甗上还发现了山西最早的族徽铭文“𠂔”。墓葬多随葬实用器,部分器物外留有烟熏痕迹。

商代晚期开始,中国青铜器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阶段。在经历了夏代和商代前期数百年的技术积累和长久发展之后,青铜器艺术臻于成熟,实用性与装饰性完美统一,终于达到鼎盛阶段。器类已很完备,形制变化多样,组合复杂,铭文加长。纹饰繁缛富丽,整体浑厚凝重,铸造工艺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此时的山西青铜器发展也就此飞跃,出现了许多罕见的珍品。这些青铜器遗存,可分为两大器群:晋西高原青铜器群和以灵石旌介等为代表的殷商方国铜器群。

晋西高原晚商青铜器,主要出土于石楼、永和两地,在保德、柳林、吉县也有个别发现,共计二百余件,食器、酒器、车马器、兵器、工具、装饰品等品类齐全,制作精美。除殷墟文化的铜礼器外,还发现了大量中原地区罕见的器类和装饰风格。这些青铜器年代主要是殷墟二、三期,上限早到殷墟一期或更早一些,下限可能已到商周之际。铜容器大

多具有殷墟铜器的一般特征,也有在仿制基础上适当改造,形成了既有殷墟铜器特点,又有自身风格的青铜器组合。小件工具和装饰品上,常用蛙、蛇、虎等动物图案装饰。此外还有一类小件青铜器,以往在殷墟基本没有发现过,尽管数量不多,但大多造型奇特,可能受欧亚草原青铜文明影响,显示了本地独有的文化特色。正是其中复杂文化因素的存在,使得这些地区长期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研究表明,晋东南长治地区有商一代一直为商文化所占据,晋中地区晚商遗存亦属商文化体系。灵石旌介商墓铜器即是商代方国文化遗存的代表,这里出土了百余件精美青铜器,是山西殷墟文化的精品之作。其中鼎、簋、爵、觚、罍、觶、尊、卣、罍等容器52件,形制、纹饰、组合等与殷墟所出基本相同,也存在少量的地方特征,多件铜器铸有族徽铭文“丙”字,当为商代晚期的方国“丙”族遗存。近年来,临汾庞杜村出土了鼎、簋、爵、觚、卣、尊等青铜容器10余件,铜铭显示与商末周初的“息”族关系密切;浮山桥北出有觚、罍等铜容器和大量车马器等,铜器屡见“先”字铭文;闻喜酒务头1座甲字形大墓中出土了鼎、甗、簋、爵、觚、罍、尊、卣、罍、盂、盘等青铜容器23件,亦多次出现同一族徽铭文。这些新发现,使晋南地区的晚商文化面貌也逐渐清晰起来,据点式分布的商文化氏族方国遗存,对促进殷墟国家结构及其西土疆域的认识有极大的帮助。

3. 西周

山西西周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全部位于临汾、运城、长治三市境内。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仍保留了商代晚期厚重富丽的风格,并新创了一些奇异的器形和纹饰,各类凤鸟纹的流行是其最显著的特色。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风格突变,造型趋向庄重简朴,胎体变薄,流行带状窃曲纹、重环纹等花纹,处处体现出西周礼制的规范。内容丰富的长篇铭文迅速普及,烙下深深的时代印记。因山西南部地位特殊,封邑众多,青铜器每一次较为集中的出土,往往就代表着当时的某一个诸侯封国或高等级贵族封地的发现,曲沃天马-曲村晋国墓地、黎城西关黎国墓地、洪洞坊堆-永凝堡杨国墓地、绛县横水邰国墓地、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等无不如此。

晋国青铜器是山西两周时期最为重要的青铜器群。天马-曲村遗址和晋侯墓地的发现,解决了早期晋都的历史谜题,西周时期的晋国青铜器也主要发现于该遗址的曲村邦墓区和北赵晋侯墓地。曲村邦墓区47座铜器墓出土青铜礼乐器150余件,共18种器类。北赵村9组19座晋侯夫妇墓存世铜礼乐器300件左右,铜礼器有鼎、鬲、甗、簋、壶、盘、尊、卣等,乐器主要是编钟,并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器形,如鸟尊、兔尊、猪尊、三足瓮、双耳罐、四足方座筒形器等。礼乐器刻铭丰富,研究价值极高,如叔矢方鼎、晋侯稣钟等,无不引起学界长久的讨论。天马-曲村遗址是山西唯一一处通过主动考古工作发现和确认的西周诸侯国都邑遗址。晋侯墓地完整保存了晋国早期的九代国君夫妇墓,出土青

铜器序列完整,不曾间断,是西周诸侯国铜器遗存中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初期的唯一案例,因而对西周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西周时期,“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在今天的山西南部还分布着许多小诸侯国,见于史载的有荀、贾、董、韩、耿、虞、黎等,另外还有一些失载的小国,因考古发现而重新得以确认,如邰、霸等。

洪洞坊堆—永凝堡遗址先后清理西周墓葬40余座,出土青铜礼乐器至少40件,时代涵盖整个西周,不少器物铸有铭文,如父丁鼎、辛又鼎、叔鬲、恒父旅簋、恒父簋、屯鬲簋、亳父乙卣等,其中NM9出土的一件西周早期的木胎铜扣壶,目前发现不多,较有特色。绛县横水发掘了1200余座墓葬,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初年,出土青铜器千余件,以M1、M2、M2158、M1006、M1011等规格较高墓葬所出最为精致。铜铭中多次出现“邰伯作某器”之语,可与传世铜器邰仲鼎相合,西周邰国就此跃出。邰为媿姓之国,青铜器有一定特色,随葬礼器组合多非成套产品。M2邰伯墓中出土的铜卣存66字的长篇铭文,颇引人关注。翼城大河口是横水墓地之外的另一处经大规模揭露的西周封国墓地,发掘2200余座墓葬,青铜器以M1、M1017、M2002等墓所出为代表,普遍制作讲究,纹饰精细,是山西西周时期非晋国铜器中的佼佼者。铭文显示,这里即霸国所在,其与周王室、燕、芮、晋、邰等国关系密切,族群可能与邰国一样来自戎狄。霸国铜器中的不少精品都铸有长篇铭文,如鸟盃、尚孟等,为研究周王室与霸国关系、周代礼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绛县睢村墓地是晋南地区的又一处西周封国遗存,但多已被盗,出土青铜器数量有限,特别是几座大墓被盗一空,令人惋惜。据发掘者判断,睢村墓地可能即史载的翟祖国。黎城西关村发掘了10座西周墓葬,M8是三座未被盗掘的中型墓之一,出土有鼎、簋、甗、壶、匜、盘等青铜礼器8件,器铭证实系“楷侯”作器,“楷”“黎”通假,此即西周时期的黎国。黎本为殷商方国,这一带也曾见到殷墟时的鼎、觚、爵等铜器。这批铜器为研究黎国在商周时期的变迁提供了重要佐证。

此外,还发现了一些见于史载但存世极少的西周诸侯国铜器,如上郭墓地出土的陈公子壶、荀侯匜、贾子匜、董矩鬲及潞河墓地出土的虞侯政壶等,都丰富了山西西周青铜器的内涵。既然文献中所记载的这些西周小国都是渊源有自,可以想见,未来会不断有更多西周青铜器发现来刷新我们的认识。

西周时期的山西青铜器是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总体观察,无论是青铜器器形、纹饰还是铸造工艺,与周代王畿地区的青铜器并没有明显的区分。至少从铜器上看,所谓西周时期的晋文化,实乃周文化的一个分支。

4. 东周

山西地区出土的东周青铜器以晋国及三晋青铜器为

主,绝大多数出自墓葬。春秋时多见于晋南地区,以侯马新田都城及其附近最为集中,如北赵、羊舌的春秋晋侯墓,侯马上马墓地,临猗程村墓地,闻喜上郭墓地,芮城坛道村M1,襄汾陶寺北墓地,隰县瓦窑坡墓地等。春秋晚期以后,随着晋国的扩张开始遍及全省,新绛柳泉铜器属晋国公室,太原金胜村铜器属赵,晋南的万荣、闻喜与芮城出土铜器属魏,晋东南长治分水岭墓地及长子、潞城与屯留等战国时上党地区所出铜器多属韩。晋北的浑源李峪铜器群具有鲜明的自身风格,是山西东周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群之一,应系灭代后的赵人遗存。除此以外,山西地区还发现了一些吴国青铜器,如太原金胜村吴王鼎、吴王夫差鉴、原平峙峪村吴王光剑、榆社城关吴王姑发剑、万荣庙前村王子于戈等,反映了这一时期不同地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

这一时期的山西青铜器总体上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春秋早期:以北赵晋侯墓地M93、M102,芮城坛道村M1,襄汾陶寺北M7等铜器群为代表,上郭墓地、上马墓地等也有遗留。这一阶段大体上是西周中晚期以来铜器风格的延续,仍保留了素朴的风气,其形制、纹饰和组合都沿袭传统,两周之际的青铜器更是较难区分。M93、M102是北赵晋侯墓地最晚的一组墓葬,一般认为是晋文侯夫妇墓,出土青铜器因而成为春秋早期的标准器。铜器风格最大的变化,则是装饰的扁平化特色,不再像西周时那样突出器表、凹凸有致,总体不够精致,略显单调粗糙,青铜器艺术处于低潮期。

春秋中期:以侯马上马墓地M13,长治分水岭M269、M270,隰县瓦窑坡M29、M30等铜器群为代表。从此时开始,随着工艺技术和装饰技术的逐渐进步,青铜器艺术再次腾飞,形成了又一发展高峰。铜器生产开始使用模印法工艺,蟠螭纹、蟠虺纹先后出现和流行,成了青铜礼器的主题纹饰。成组的编钟仍然流行,但铭文明显减少,现藏于台北故宫的子犯编钟记载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后返晋掌权及晋楚城濮之战等重要史实,是此时铜器铭文的代表。青铜器的地域风格趋于形成,这一阶段正是晋国霸业辉煌的时期,晋国青铜器因其丰富的器类、多变的造型、精美的装饰风格、先进的铸造工艺而在当时的诸侯国中独树一帜,引领风气,成为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代表,并最终形成了脱胎于周文化又不断增益而具备鲜明特色的“晋系青铜器”。

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以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太原赵卿墓、浑源李峪等铜器群为代表。春秋中晚期之际,晋国迁都新田后,铜器风格在传承中逐渐又有了新的变化,伴随着晋国新田铸铜作坊的兴起,晋国及三晋青铜器步入了最为繁荣发达的阶段。牛村古城南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陶范器形可辨、纹样鲜明,很多可与实物比对,为东周青铜器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考古材料。太原金胜村M251赵卿墓是迄今发掘的东周时期等级较高、规模较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1402件,仅铜礼器就达99件,包括列鼎7件,甗、鬲等炊食器,盃、豆等食器,壶、罍、鸟尊等酒器及盘、匜等水器等,这些铜

器大多造型优雅,纹饰精美,制作精湛,无不体现着三晋铜器的泱泱大国风范。浑源李峪铜器群存世约80件,其中食器、酒器、水器等铜容器约40余件,散存于境内外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这批铜器风格独特、美轮美奂,当时一出土就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春秋战国之际正值列国纷争、文化交流频繁,浑源李峪所处的农牧文化交错带的特殊位置,使其文化内涵多样,既有晋、燕铜器共性,又充满地域特色,无疑是山西东周青铜器中难得一见的珍品。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晋系青铜器繁缛华丽的装饰再度盛行,透露出自由浪漫、清新飘逸的作风。蟠螭纹、蟠虺纹等主流纹饰变化多样,在精细中透出粗犷之气。错金工艺开始广泛使用,器表呈现华丽斑斓的色彩,观赏性增强;人物图像纹渐次盛行,反映了农桑、弋射、宴饮、攻战等各种场景,传统的铜礼器功能开始趋于实用化;薄胎槌制铜器的刻纹技术也得到长足发展,如金胜村刻纹匜、潞城潞河M7的刻纹匜等。这时的山西及其邻近地区所出的青铜器,几乎无不显示出受侯马铸铜作坊的影响,充分反映了晋国及三晋铜器制造业的繁荣和发达,青铜器成了流水线上的商品,铜器生产呈现出批量化、标准化。在多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中国青铜器由此走上了新的巅峰。

战国中晚期:以庙前村61M1、分水岭M12、M25、M26、M36等铜器群为代表。青铜器精细繁缛的作风发展到极点,到战国早中期之时又再度衰落,继之兴起了装饰简省的全素面青铜器。器身满饰花纹的现象极少再见到,更多的是简练明快的流云纹等几何纹样,器壁轻薄,重量减轻,形制固化,形体普遍偏小,为弥补素面的单调,装饰工艺仍有所发展,嵌错和鎏金工艺得到了广泛应用。技术的进步和观念的变化也逐渐揭开了青铜器神秘的面纱,原本陈于庙堂、专于礼仪的青铜器,在这一阶段终于走向了生活化,不再追求器形的多样,更多关注其功能的实用性,高等级的礼乐器仍然存在,铜镜、带钩、灯具、器座等日用铜器大量出现,铜戈等兵器成为各地区最常见的器类,先秦青铜器发展到了最后的阶段。

5. 秦汉

山西汉代青铜器虽然出土地点不少,但最具代表性的器群,无疑是右玉大川窖藏坑、平朔汉墓群、太原东太堡清河太后墓所出土的三批铜器。右玉大川铜器群发现于1962年,出土鼎、温酒樽、酒樽、盘、环等共9件铜器,据铭文确定是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胡傅所造。其中两件温酒樽通体鎏金,腹部及盖面浮雕虎、羊、牛、猴、龙、狐形象,器底接三个粗壮蹄足。另外1件酒樽亦通体鎏金,腹部彩绘虎、象、鹿、马、兔、羊、骆驼等动物纹,下接三只虎形足托底。整器造型浑厚,做工精美,浮雕的飞禽走兽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是西汉铜器中不多见的精品。平朔一带是汉代马邑县所在,是汉朝抗击匈奴的前哨。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平朔汉墓,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时代从西汉初年延至东汉早期,种类繁多,品种齐全,既有鼎、甗、钟、钲、釜、簋、盘等铜容器,也有各种式样的铜灯、熏炉、铜镜、带钩等日用铜器及兵器、车马器等,是研究汉代青铜器的极好材料。这里出土的铜雁鱼灯,造型优雅,系利用科学原理制作的一件汉代环保灯具,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研究价值,类似的铜灯,早年还在襄汾吴兴庄出土1件。1962年发现的太原东太堡清河太后墓,出土钟、钲、鼎、盆、洗、扁壶等铜器30余件,据“清河太后中府钟”铭断定此墓主人系西汉代恭王刘登之妃、代刚王刘义之母,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批西汉中期的断代标准器。最近在这一带还发现了更高等级的西汉时期贵族墓葬,这些正是晋阳作为汉代诸侯国都城,政治地位极为重要的真实写照。秦汉青铜器某种程度上仍是战国中晚期铜器的余晖,青铜器的日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出现了许多新的品种,最流行的器类是鼎、壶、钟、钲、尊、釜、簋、簠等容器及各种灯、熏炉、带钩、铜镜等日用器皿,记事铭文早已不见,“物勒工名”进一步发展,变为纯粹适应生活需求。以上述及的发现中,尽管仍存有不少精湛之作,但属于青铜器的繁华时代终究还是结束了。

目 录

1. 圆鼎	1	27. 方鼎	30
2. 圆鼎	2	28. 甗	32
3. 圆鼎	3	29. 甗	34
4. 圆鼎	4	30. 簋	36
5. 圆鼎	5	31. 簋	37
6. 圆鼎	6	32. 簋	38
7. 圆鼎	7	33. 铃豆	40
8. 圆鼎	8	34. 铃豆	41
9. 方鼎	10	35. 匕	42
10. 簋	11	36. 匕	42
11. 爵	12	37. 匕	43
12. 觚	13	38. 爵	44
13. 斚	14	39. 爵	45
14. 斚	15	40. 爵	46
15. 罍	16	41. 爵	47
16. 罍	17	42. 爵	48
17. 圆鼎	18	43. 爵	50
18. 圆鼎	19	44. 爵	52
19. 圆鼎	20	45. 爵	54
20. 圆鼎	21	46. 爵	55
21. 圆鼎	22	47. 觚	56
22. 圆鼎	23	48. 觚	57
23. 圆鼎	24	49. 觚	58
24. 圆鼎	26	50. 觚	59
25. 圆鼎	28	51. 觚	60
26. 方鼎	29	52. 觚	61

53. 觚	62
54. 觚	63
55. 觚	64
56. 罍	65
57. 罍	66
58. 罍	68
59. 觶	70
60. 觶	72
61. 尊	73
62. 卣	74
63. 卣	75
64. 卣	76
65. 卣	78
66. 卣	80
67. 觥	82
68. 觥	83
69. 壶	84
70. 罍	85
71. 甗	86
72. 甗	87
73. 甗	88
74. 甗	89
75. 甗	90
76. 斗	91
77. 斗	92
78. 盘	93
79. 盘	94
80. 铃	95
81. 铃	95
82. 钺	96
83. 钺	97
84. 戈	98

85. 戈	99
86. 戈	99
87. 矛	100
88. 矛	101
89. 刀	102
90. 刀	102
91. 斧	103
92. 斧	103
93. 剑	104
94. 弓形器	105
95. 弓形饰	106
96. 弓形饰	107
97. 管状器	108
98. 鸟面形饰	109
99. 靴形器	109
100. 筭	110
101. 筭	110
102. 圆鼎	111
103. 圆鼎	112
104. 圆鼎	113
105. 圆鼎	114
106. 圆鼎	115
107. 圆鼎	116
108. 圆鼎	117
109. 圆鼎	118
110. 圆鼎	119
111. 圆鼎	120
112. 圆鼎	121
113. 圆鼎	122
114. 圆鼎	123
115. 圆鼎	124
116. 圆鼎	125

117. 圆鼎	126
118. 圆鼎	127
119. 圆鼎	128
120. 圆鼎	129
121. 圆鼎	130
122. 圆鼎	131
123. 圆鼎	132
124. 圆鼎	133
125. 圆鼎	134
126. 圆鼎	136
127. 圆鼎	137
128. 圆鼎	138
129. 方鼎	139
130. 方鼎	140
131. 方鼎	141
132. 方鼎	142
133. 方鼎	143
134. 方鼎	144
135. 方鼎	145
136. 方鼎	146
137. 方鼎	147
138. 鬲	148
139. 鬲	149
140. 鬲	150
141. 鬲	151
142. 鬲	152
143. 鬲	153
144. 鬲	154
145. 鬲	155
146. 鬲	156
147. 鬲	157
148. 甗	158

149. 甗	160
150. 甗	161
151. 甗	162
152. 甗	164
153. 甗	166
154. 甗	168
155. 甗	170
156. 甗	172
157. 甗	173
158. 甗	174
159. 簋	176
160. 簋	177
161. 簋	178
162. 簋	179
163. 簋	180
164. 簋	181
165. 簋	182
166. 簋	183
167. 簋	184
168. 簋	186
169. 簋	188
170. 簋	189
171. 簋	190
172. 簋	191
173. 簋	192
174. 簋	194
175. 簋	196
176. 簋	198
177. 簋	200
178. 簋	202
179. 簋	204
180. 簋	206

181. 簋	207
182. 簋	208
183. 簋	210
184. 簋	212
185. 簋	214
186. 簋	216
187. 簋	218
188. 簋	220
189. 豆	221
190. 豆	222
191. 豆	223
192. 孟	224
193. 盆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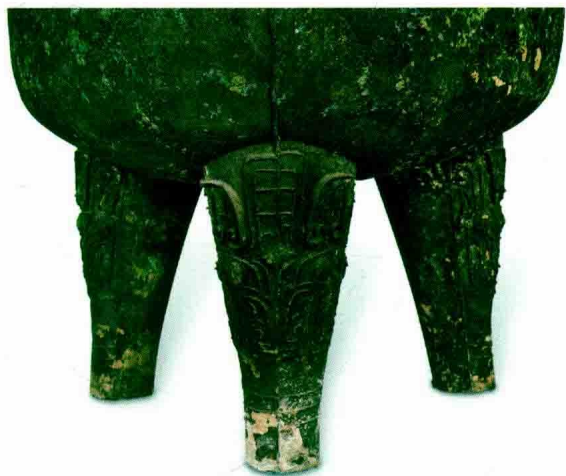
194. 盆	226
195. 盆	227
196. 匕	228
197. 爵	229
198. 爵	230
199. 爵	232
200. 爵	233
201. 爵	234
202. 爵	236
203. 爵	238
204. 爵	240
205. 爵	242

1. 圆鼎

商代前期

通高73、耳高13、口沿外径47.5、内径41.3、腹深40、壁厚1厘米
出土于山西省平陆县坡底乡前庄村，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方唇、侈口，立耳，弧腹较直，下腹弧收成圜底，袋形足。腹部饰三组带状兽面纹，兽面纹两侧各饰有两小夔，用来填兽面纹尾部向上卷曲形成等空白。袋足上饰有大耳兽面纹，兽面纹下为三周凸弦纹。





2. 圆鼎

商代前期

通高23、口径16厘米，重1750克

出土于山西省隰县庞村，现藏于隰县文管所。

立耳，折沿，深圆腹下鼓，半空心锥形足。素面。底部有烟炱痕迹。

